

鄭頤壽◎著

辭章學 | 導論

辭章學即「廣義修辭學」，

它包含了修辭學、風格學、語體學等內容，

漢語辭章內涵的豐富與耀眼，

再次驗證了中華文化的博大深邃。



辭章學 | 導論

鄭頤壽◎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辭章學導論 / 鄭頤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2003[民 92]

面 : 公分

ISBN 957 - 739 - 458 - 2 (平裝)

1. 中國語言 - 修辭

802.7

92018320

辭章學導論

著 者：鄭頤壽

發 行 人：楊愛民

出 版 者：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電話(02)23216565 · 23952992

傳真(02)23944113

劃撥帳號 15624015

出版登記證：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網 址：<http://www.wanjuan.com.tw>

E-mail：wanjuan@tpts5.seed.net.tw

經 銷 代 理：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 號 4F

電話(02)27953656(代表號) 傳真(02)27954100

E-mail：red0511@ms51.hinet.net

承 印 廠 商：晟齊實業有限公司

定 價：600 元

出版日期：2003 年 11 月初版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公司更換，謝謝)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57 - 739 - 458 - 2

陳 序

鄭頤壽教授，是海峽兩岸知名的漢語辭章學家。能有幸認識他，是緣結於三年前（2000）的六月九、十日在高雄師大舉行的「第二屆中國修辭學學術研討會」圓滿結束之後。記得剛回到臺北不久，就接到黃麗貞教授的電話，說鄭教授對我的研究所導生仇小屏在會中所發表的〈試談字句與篇章修飾的分野〉一文很感興趣，希望在離臺之前，能和我與小屏見一面談談，於是在修辭學會理事長蔡宗陽教授的安排下，十二日晚於臺北為兩岸學者所舉辦的一次餐宴裡，我們見面了。

當時在座的，除鄭頤壽、蔡宗陽、沈謙等三位教授、我和我的兩個導生仇小屏與陳佳君之外，還有濮侃、黎運漢、鄭遠漢、李名方、袁暉、李金苓、柴春華、趙毅等大陸學者。大家圍坐於長方形餐桌前，從修辭學談到文學界之種種，從此岸談到彼岸，真是無所不談。而剛好鄭頤壽教授就坐在對面，彼此交談得更為深入而歡洽。

這次歡聚後，鄭頤壽教授和我們之間，就經常以書信或電話交換研究心得。令人佩服的是，他對辭章學研究的熱忱與執著；而對臺灣辭章章法學研究的肯定與支援，更使我感激不已。他不僅以書信或電話多所激勵，又先後在福州、蘇州所舉辦之海峽兩岸文化學術研討會上，特以臺灣辭章章法學之研究為主題發表論文，廣予宣揚，大力地替臺灣辭章章法學之研究打氣，認為臺灣辭章章法學之研究成果，是「豐碩的」、「空前」的。這種學術衿懷與情誼，是極其珍貴的。

「漢語辭章學」是由語言學大師呂叔湘、張志公等先驅極

力倡建的一門新學科。鄭頤壽教授深受影響，積累了多年之研究與開發，已大大地為修辭學、語體學、風格學直至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的理論研究，開拓了一個新的視野，為「漢語辭章學」建立了學科最大的理論框架「四六結構」，並以之為統帥，解決了辭章學及其相關學科一系列宏觀、中觀、微觀的理論問題。尤其是他從哲學高度，解決了過去爭論的、或懸而未決的、或被忽視了的不少問題。以「誠美律」之「誠」而言，他主要溯其源於儒家「五經」之一的《禮記·中庸》所指出的「誠者，天之道也」，將「天之道」理解為自然規律、宇宙規律，來解釋「修辭立其誠」的道理；而且認為莊子把「誠」與「真」聯繫起來，說「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莊子·漁父》），這與儒家的「誠者，天之道也」之說是相通的。以「美」而言，他認為我們祖先論「美」，重「美」的客體，北齊劉晝就說：「物有美惡，施用有宜」（《劉子·適才》），這就把「美」與「物」與「用」聯繫起來了；既重藝術之「審美」、怡情作用，又重實際之「致用」、適用價值。這樣從哲學高度來加以梳理，確實解決了不少問題。

他又指出：誠的同義詞、近義詞有：真、信、忠信、樸誠、真實、真率、德、善等；美的同義詞、近義詞有：達、文、工、妍、巧、妙等。古人常把它們結合起來鑑識、評論文學作品、言語活動。孔子的「情信辭巧」說、王充的「辭妍情實」說、陸機的「意巧言妍」說、劉勰的「理懿辭雅」說、歐陽修的「事信言文」說等等，都可以看成「誠美」的理論。「誠」側重在內容，「美」側重於形式，兩者兼論，是合乎辯證法的。

把「誠」、「美」提到「律」的高度的，首推劉勰，所謂「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文心雕龍·徵聖》），其中的「志足」、「情信」相近於「誠」，「文」、「巧」是「美」的異名詞，而「玉牒」、「金科」就是「律」。鄭頤壽教授認為這樣的「誠美律」，對於辭章（含修辭）活動、文學創作、語文教學，甚至於待人接物，都是有意義的。

就這樣，鄭頤壽教授受到辭章學先驅呂叔湘、張志公兩先生的啟發，從一九六一年以來，便努力耕耘新園地，於「文革」期間躲進圖書館潛心研究，結果將心得寫成幾部書稿。又於一九七九年開始利用在高校講授「中國古典文學」、「現代漢語」、「古代漢語」，尤其是「文選與寫作」的課程，把辭章學的理論融化於其中，並按呂叔湘先生指出的「修辭學，或風格學，或詞章學—這是語言研究的另一個部門」的路子進行研究，相繼推出：《比較修辭》（1982）、《新編修辭學》（1987）、《文藝修辭學》（1993）等修辭學編著；推出：〈論「比」和比喻〉（1981）、〈因體施教〉（1986）、〈語體劃分概說〉（1987）、〈鼎立：電信體的崛起〉（1992）、〈論語體與修辭風格〉（1988）、〈論「體素」與「格素」〉（1994）、〈論文章風格與言語風格〉（1994）等近百篇相關的系列論文；推出《辭章學概論》（1986）和充分體現讀寫雙向互動和語言綜合運用的《辭章藝術示範》（1991）等同體例編著五本；推出：「辭章藝術大辭典」（出書時改稱《中國文學語言藝術大辭典》1993）及其姐妹書《辭章學辭典》（2000），以及按「表達⇌承載⇌理解」雙向互動，融入詞匯學、音韻學、語法學、修辭學、風格學的《對偶趣談》（1992）、《對偶趣話》（1999）二

本等。

此外，在鄭頤壽教授之領導下，福建師大的辭章學研究者，又申請成立了辭章學研究室、所，招收了辭章學碩士研究生，在漢語言文字學博士點中設了辭章學的研究方向，並申請成立了「中國修辭學會辭章學研究會」的全國性學術團體。福建的學者在研究的過程中，比較重視進行理論的探討，對辭章學的理論框架、對象、體系、定義、性質、功能、目的、任務、研究的方法、發展的步驟、前途等進行探討，總結出「四六結構論」、「四元世界說」、「三辭三成說」、「四在效果說」、「結構組合結論」、「辭章生成論」、「辭章解讀論」、「四個階段論」、「『表達 $\Rightarrow$ 承載 $\Rightarrow$ 理解』雙向互動論」、「誠美律」、「言語規律」、「語體文體對應論」、「語體媒介三分說」、「語體平面論」、「體素論」、「格素論」、「風格優劣論」、「風格優化論」等；同時也重視對傳統理論作系統的整理、歸納，對中外現代語言學理論的學習、借鑑和實際運用（包括聽說讀寫）問題的探討。（以上參見鄭頤壽〈辭章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文天地》19卷3期，頁87-97）。

由此可見，鄭頤壽教授對「漢語辭章學」這一新學科，不但兼顧宏觀與微觀來研究，也將理論與實際應用作了高度之結合，尤其從中提煉出「四六結構」與「誠美律」，將「真」、「善」、「美」融為一體來統括「漢語辭章學」，其貢獻與影響是極大的。而此次應萬卷樓圖書公司之約，特將他集其理論大成之專著《辭章學導論》、《辭章學新論》兩書在臺灣出版，這可說是臺灣辭章學界的一件大事，其貢獻與影響之大，更是可以預期的。

身為鄭頤壽教授的學術盟友，又屬「漢語辭章學」研究團

隊中之一員，而且又忝兼萬卷樓圖書公司之名譽董事長，因此在此出版前夕，特綴數語，聊以表達誠摯的祝賀與感謝之忱。

陳滿銘 序於臺灣師大國文系835研究室

2003年10月11日

自序

電臺設導播，參觀請導遊，要進辭章學理論的殿堂，則要「導論」。

漢語辭章學的殿堂，金碧輝煌，其中的珍寶琳琅滿目。可是大量的珍品卻融化在詩話、詞話、文評、曲語、史論以及評注、小品之中，是璞中之玉。十多年前，筆者組織了百位專家，對之進行梳理，編成了百萬字的《辭章學辭典》。雖然還僅僅是這殿堂中一小櫥子的珍品，但已可以看出，它比起東方之美辭學、西方的修辭學，不但毫不遜色，而且內容更加豐富，可稱之為「大修辭學」或「廣義修辭學」。它具有濃厚的中華風、民族味，折射出中華文化耀眼的光輝，更切合我國運用語言文字的特點和傳統的經驗。在梳理的過程，我們十分注意站在「今天」「中國」的平臺上，用科學的觀點和理論的思辨進行分析；又留心向西方和東國學習，借鑑它們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去粗取精，揚棄、昇華、熔鑄，建立起科學的體系，使之真正可以成「學」。

三四十年來，筆者鍾情於此道，於1986年推出《辭章學概論》，其後又與志同道合的學會諸君，合力推出《辭章藝術示範》及其姊妹書五種，《辭章學辭典》及其姊妹書兩部，總計三四百萬字，用之於教學。反覆實驗，再三修改，不斷琢磨，又寫成百萬字的《辭章學論稿》，作為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講義。欣承陳滿銘教授垂青、推介，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願給出版。因篇幅頗巨，只好「一分為二」：分作《辭章學導論》、《辭章學新論》（以下書中分別簡稱《導論》、《新論》）

兩書出版。兩書可各自相對獨立，又可合成一體。

此書重在「論」，旨在闡釋建立這門新學科之理論框架、理論體系及其根本的規律、方法。配合此書的讀本，除了《辭章藝術示範》等書之外，另有合作書《大學辭章學》、《辭章藝術趣話》等，這些書則重在「用」。「用」與「論」，體現了普及與提高的關係，以適應不同文化水平讀者的需求。

為編著上述辭章學書稿，消盡了自己的青春，「綠鬢勞中減」，「春光化秋色」；尤其是最近為籌辦閩臺辭章學研討會，十分辛勞，再加上主編、出版會議論文集，整理、修訂此書稿，日夜不輟，寢食繫之。辛勞耕耘所得，倍感敝帚自珍，其中缺點錯誤肯定不少，敬祈大方之家與讀者諸君教正。

此書在編輯出版的過程，承蒙中國修辭學會辭章學研究會顧問陳滿銘教授審定並作序，梁錦興經理、陳欣欣小姐給予此書出版之大力協助；此前，全國文學語言研究會副會長林大礎先生、郭翠蓮教授、魏剛教授通讀了書稿，也提了很好的修改意見和建議。在此，一併致以深深的謝忱！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鄭頤壽

2003年秋於五鳳南麓之榕蘭齋

目 錄

陳 序	
自 序	
前 言	001

㊟ ㊟ 普通辭章學理論概說

壹、「四六結構」導源(一) 039

- 一、「四六結構」導源於言際交際、藝術實踐和文化活動 040
- 二、「四元」簡析 048
- 三、「六維」簡析 065

貳、「四六結構」導源(二) 091

- 一、「四元」、「六維」的部分組合 091
- 二、再談「四元」、「六維」的部分組合 111
- 三、三談「四元」、「六維」的部分組合 130
- 四、四談「四元」、「六維」的部分組合 152

叁、「四六結構」導源(三) 181

- 一、「四六結構」綜述(一) 181
- 二、「四六結構」綜述(二) 196
- 三、「四六結構」綜述(三) 207

〔附〕本書「話語」含義解說 214

肆、「四六結構」與普通辭章學理論(一) 220

一、「四六結構」與普通辭章學理論框架 220

二、「四六結構」與「三辭三成」說 230

三、「四六結構」與普通辭章學定義 252

〔附〕陳望道修辭學思想的兩度飛躍——陳張一致論 277

四、「四六結構」與普通辭章學的研究對象 290

五、「四六結構」與辭章學體系 307

伍、「四六結構」與普通辭章學理論(二) 322

一、「四六結構」與普通辭章學的性質 322

二、「四六結構」與「四在效果」 345

三、「四六結構」與語境 355

四、「四六結構」與結構組合結合論 365

五、建立普通辭章學的任務、目的和方法、步驟 373

◎◎ 漢語普通辭章學與相關學科

壹、普通辭章學與語法學、修辭學 381

一、辭章與語法、修辭分合論 382

二、普通辭章學與修辭學 390

三 現代漢語修辭學導源於古代漢語辭章論 400

貳、普通辭章學與文章學、文章修改 412

- 一、普通辭章學與文章學 412
- 二、普通辭章學與文章學、文章修改 419

ⓉⓈ 普通辭章學的原則、規律與方法舉隅

壹、辭章活動的最高原則：「四六結構」

與誠美律 431

- 一、「誠」論 432
- 二、「美」論 459
- 三、誠美的辯證法 498

貳、「四六結構」與言語規律 516

- 一、論言語規律——兼呈鄭子瑜先生 516
- 二、再論言語規律（提綱）——微觀結構律 539

叁、言語規律的綜合運用 549

- 一、辭章與語格簡論 549
- 二、「四六結構」與修辭過程 557
- 三、藝法舉隅——論「比」和比喻 572

後記 595

主要參考文獻 597

前 言

辭章學就是「大修辭學」，又稱「廣義修辭學」，因此，本「自序」緊密聯繫修辭學進行分析。

辭章是「話語藝術形式」，它包含口語之話篇、書語之文篇，包括藝術體、實用體及其融合體。漢語辭章具有鮮明的融合性和民族性，因此，本書廣泛地借鑑語言學、修辭學、語體學、風格學、文學、鑑賞學、批評理論、資訊學、心理學和美學等相關學科和鄰近學科的理論、規律和方法，或取其精華，尤其重視深入地挖掘、整理我國古典「詩文評」裡面有關辭章的理論，或加以改造、熔鑄，發揚優良傳統，弘揚民族精神，突出民族自己固有的特點，這不僅更切合於指導語言實踐，而且有助於增強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我們感到有了鮮明的民族性，才更具有世界性。在商品大潮洶湧、物欲橫流的今天，在國際上強勢文化襲捲而來的時代，我們更要重視從各個領域弘揚並培育民族精神，為建設先進的文化盡點綿力。

建立漢語辭章學，在學習、借鑑上述學科有關理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必須思考這門學科亟須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如何解決實際應用問題，探索學科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1961年，語文學、語言學泰斗呂叔湘先生在《漢語研究工

作者的當前任務》一文中說：

我們能夠逐漸建立起來自己的漢語詞章學（或漢語修辭學，或漢語風格學）^①。

這話，看似平淡，卻耐人琢磨。我想：1932年陳望道先生的《修辭學發凡》（以下簡稱《發凡》），1952年呂叔湘、朱德熙兩位先生的《語法修辭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等書中的修辭理論，難道不是「自己的漢語修辭學」嗎？呂先生把自己都擺進去了，可見他毫無貶低1961年前修辭學研究成果的偏見，而是從現實的語言運用、從學科發展的前瞻性出發，對整個語言學界提出新的任務。

《發凡》和《講話》，都是漢語語法修辭學研究的豐碑。

鄭子瑜先生引用復旦大學語言研究室專家寫的《陳望道同志的治學特點》一文的話說：陳氏「從理論上對修辭學的對象、任務、研究方法等作了科學說明，創立了我國第一個科學的修辭學體系，開拓了修辭學研究的新境界」^②。宗廷虎先生說它是「被公認為現代修辭學的里程碑」^③。鄭子瑜、宗廷虎與陳光磊三先生為正副主編的《中國修辭學通史》（近現代卷）又說：《發凡》是「現代修辭學的第一道里程碑」^④。袁暉先生則說：《發凡》是「中國現代修辭學的奠基之作」^⑤。這些評價，都是很確切的。他們用不同的語言充分肯定《發凡》的歷史性成就。所謂「創立了我國第一個科學的修辭學體系」，說明此前的「修辭學」還是不夠科學的；所謂「里程碑」，指的是修辭學歷史發展過程中可以作為標誌性的著作；而「第一道里程碑」，則進一步說明其成就是空前的；所謂「奠基之

作」，比喻《發凡》為現代修辭學的學科建設打下了基礎——在其上應該蓋起學科高樓大廈的建築群。「第一個」，而不是「最後一個」，「里程碑」，而不是終點站牌，「基礎」，而不是高樓大廈的全部。此中深含辯證法。

上個世紀50年代初，呂叔湘和朱德熙兩位先生合著的《語法修辭講話》，風行一時，「成為全國學習語法修辭知識的基本教材，對於語法修辭知識的普及起了巨大的作用」，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對修辭理論的研究也有新的開拓。它從讀者理解的角度來講修辭，把「讀」與「寫」結合起來；分析修辭效果，主觀、客觀並重，合情合理；以實用文字為主，彌補過去修辭學只注目於文藝體之不足；在研究範圍上有突破，有深度，對原有的修辭學「作了一次較大的革新和改進」，「是我國建國初期甚至是整個20世紀中，影響最大的一本普及性著作」^⑥。呂先生為人正直，胸襟開闊，眼界高遠，並不以此為滿足，上述所說的「能夠逐漸建立起來自己的漢語詞章學（或漢語修辭學，或漢語風格學）」，是對整個學術界而言，當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內了。這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

陳望道先生就是出於這種態度，說過一段名言：

修辭的述說，即使切實到了極點，美備到了極點，也不過從空前的大例，抽出空前的條理來，作諸多後來居上者的參考。要超越它所述說，並沒有什麼不可能，只要能夠另闢新境，別創新例，至少能夠另立新解^⑦。

一種學科，在歷史的某一時期即使「切實到了極點，美備到了極點」，但是歷史向前發展，用新的眼光再去反觀它，就

不難發現其不足之處。我們就是要從這一點來理解呂先生提出的「我們能夠逐漸建立起來自己的漢語詞章學（或漢語修辭學，或漢語風格學）」的深意。現當代的許多修辭學家就看出了這一點，鄭子瑜^⑧、袁暉、宗廷虎^⑨、周振甫^⑩、譚永祥^⑪等都從總體上充分肯定《發凡》的劃時代成就，也看到其不足之處。袁暉先生說得好：「當然還可以找出這樣那樣的缺點和不足，可是跟這部著作的偉大成就相比較，也就微乎其微。」^⑫袁先生在充分肯定《講話》的歷史性成就的同時，也指出其不足之處^⑬。因此，我們首先要看到《發凡》與《講話》的卓著成就，學習之，發揚之，而不應誤認為修辭學的事都被他們做盡了，無所作為了，不應把當代某些學者的一些創新——說出與陳先生和呂先生不同的話的——「斥」為「越了雷池」，似乎「菲薄了前賢」，「不謙虛」，甚至「狂妄」。這是學術研究上的幼稚病。同時，還要認識到：雖然《發凡》和《講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尚有某些不足之處，但是不應超越歷史，苛求先賢。有些人竟說「搬掉×××，發展修辭學」。這是學術研究上的盲動症。「後來者」要以前賢的研究為起點，「另創新例」，「另立新解」，甚至「超越它」——這是站在前賢肩膀上的「超越」，這才符合陳、呂等先生的諄諄教誨和殷切希望。

1961年呂先生這次講話之後，修辭學界的「後來者」推出的修辭學著作三四百種，其中有影響的就不少^⑭。它們闡述了《發凡》、《講話》未涉及的內容，有的還建立了不同的學科體系，論析了不同於《發凡》的觀點。這是一種進步。漢語風格學研究也開拓了新的局面，推出二十多部新著作，填補了陳先生「沒有深入地談到風格」的空白^⑮。漢語辭章學的研究，雖